

一九五〇年
中國語文問題
論文輯要

杜子勁編

大衆書局印行

一九五〇年
中國語文問題
論文輯要

杜子勁編

大衆書店印行

一九五〇年中國
語文問題論文輯要

書號：京226 (發)

32K, 320 P, 1.1500元

大眾書店 印行

北京西四北大街

不 准 翻 印

人民日報第二印刷廠排
北京解放印刷廠印

初 版：1952年12月

(0001-2500)

序

我對於語文問題資料的搜集與整理，曾經有過這樣的打算：從1949年起，把每一年的資料分月分日地記錄下來，選擇整理，編印成冊，以供關心語文問題的同志們去參考，以節省翻查之勞，自己看起來也方便。這種每年印一冊的書，可以叫做“年刊”。1950年編印出一本“一九四九年中國文字改革論文集”（大衆出版），那是“年刊”的第一冊，現在編印出的這一本“一九五〇年中國語文問題論文輯要”是“年刊”的第二冊。

這本書是早該出版的，按理應該在1951年的一二月間出版，沒有想到遲到今年的三月間才出版。原因當然可以舉出好幾條，比如材料多，工夫少，排校不易等，但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拖拉與笨拙。去年秋天就接連接到關心這本書的幾位讀者來信催問，我趕緊分別回覆，說是快出版了；我實在是騙了他們，事實上是慢得很，很覺對不起他們。

1950年的語文問題的材料很多，單以文章的篇數計，共搜到四百一十二篇，實際上的數目當然還要多。1949年的有關語文問題的文章，只搜到五十二篇，兩相比較，1950年的材料差不多增加了八倍。因此這一本的內容也比前一本豐富了些，除論文及附錄外，又增加“重要言論·消息”及“參考文件”兩部分。論文部分分爲八項，共選錄三十五篇，重要言論·消息十二條，參考文件八篇，附錄兩篇。

論文的選錄仍照過去的以較重要的、完整的，足以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見的爲標準；不過這一次又新加了一條限制，就是：凡是已經見於單行本的不再選入。原因是有了單行本，查閱容易，再選就重複了、浪費了。所以這一年的已經選定的幾篇論文，後來因爲見於單行本，又抽下來了。例如這一年在語言方面頭等重要的論文斯大林的論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三篇文章，這裡並沒有選，就是因爲有了解放社、時代出版社等的單行本的原故。黎錦熙先生的“論斯大林所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在中國文字改革運動中的問題”及他的論注音漢字問題的文章，也因爲都見於他的“中國文字與語言”（上）抽下了。先發表在新文字週刊的倪海曙先生的“新文字的同音辭問題”等篇，張雁先生的“新文字理論講話”各篇，也因爲後來有了“北方話新文字課本”（倪編）和“中國新文字入門”（署Zhangjan編著）的出版而抽下了。

這一年語文問題的討論所涉及的範圍是很廣泛的，分開來說，有語言問題、文法問題、漢字改革問題、漢字簡化問題（包括簡筆字與標準字）、漢字注音問題，以及新文字運動、民族形式、科學文字等問題。重要的是以斯大林所論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爲中心的對中國語文問題的爭論。斯大林的這一輝煌的著作，照耀到中國來，在我們的語文問題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把馬爾的語言學說給予中國語言學的影響清洗了，把中國語文問題深刻化了，討論中展開了共通語問題的討論是很重要的，也是全國解放後一個新題目。另外一個新題目是文法問題。這是人民日報社首先提出來的，不久就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1951年的更普遍的注意，更多人的學習語法與修辭，就是從這一年發展開來的。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這一年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開展。僅就所得到的材料來說：正式成立新文字團體，如新文字工作者協會、

新文字研究會等，計有二十二個地方。各地開辦學習班、研究班，舉行座談會，舉辦新文字廣播，參加的人數大約有兩萬人左右，活動的地區普遍南北，約有六十多個地方。出版的定期刊物有八種，出版的新文字書籍有三十多種。（參看 219 頁倪海曙“解放一年來全國新文字運動的大概情況”）這是並沒有經過有系統的領導與有組織的推動，就有了這樣的開展。這說明了什麼呢？這是由於漢字改革的迫切需要呢，還是由於拼音文字的優越性呢？這是值得我們去注意的。

最後要提到的是這一年的文字改革方案仍舊是“層出不窮”。這是一部分熱心於文字改革的同志在不聲不響地作着嘔心血的工作。方案是各種各樣都有，但大都沒有地方發表。有的還能自費印出少量份數，分贈友人，有的却只能抄寫下來寄給有關部門。僅是個人所得到的就有：占豆元“北京話的寫話表音方塊字表”跟“北京話的寫話拼音文字草案大綱”，李自修的“匯字研究”，洪鐘的“東方拉丁化內含拼音新字”，宇文長工的“北京話新文字”，賀強的“工農大眾適用簡易新字”，丁西林的“筆畫音標方案”，齊滄田的“中國北方新文字”，陳永康的“仲家語拉丁化學習草案”等。見到的有李粲如、朱聃、貝友林、陳崑、吳永、夏森、沈光增、陰法魯、唐克全、李鴻影、郭茂章等家的方案。也曾經打算把各家的方案選出幾種來摘要介紹，以供關心於文字改革者的研究或參考。後來瞭解到佔篇幅太多，印刷困難（有幾種須另製版），終於把這種計劃打消了。

本書各篇文章的作者不僅答應了我的選錄，並且大都予以或多或少地修正，我敬向他們致以極誠懇的謝意！

杜子勁在北京序 1952, 2, 8.

目 錄

序.....	(1)
--------	-------

【論文】

語 言 問 題

中國語言學的新方向.....	羅常培 (1)
漢族語言的分佈.....	周有光 (10)
研究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的重要性.....	羅常培 (13)
論文字改革與語言改革.....	高名凱 (18)
論“語言從分歧到統一”.....	R.M.S. (26)
斯大林論語言學對於中國語文問題的啓示.....	張銳光 (30)
斯大林語言論與拉丁化運動.....	周有光 (39)
共通語、方言及其書面化.....	黃典誠 (51)
論共通語.....	周有光 (70)
論語言的統一.....	鄭梅林 (78)

文 法 問 題

請大家注意文法.....	人民日報短評 (82)
漢語語法的幾個特點.....	王雲章 (85)

漢 字 改 革

談方塊字的改革.....	沈起予 (90)
--------------	------------

不要再在方塊字裡翻跟頭啦.....	L.X. (92)
漢字淘汰的條件.....	施効人 (95)
方塊字妨害了工人的文化跟技術的進步.....	林 曦 (99)
普及教育所迫切需要的幾項文字改進工作.....	鄭林曦 (103)

漢 字 簡 化

目前能做些什麼？.....	陸志韋 (107)
常用漢字應該標準化.....	寒 生 (113)
談談漢字標準化.....	丁聲樹 (114)
漢字簡化的道路.....	Boxan (116)
從漢字的發展談到簡體字的應用.....	陳榕甫 (119)
新文字和簡化漢字.....	吳廉銘 (130)

新 文 字 運 動

新語文運動的性質跟目前的任務.....	杜子勁 (135)
拉丁化運動的任務和方向.....	周有光 (139)
對於解放以後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一些感想.....	倪海曙 (144)

民 族 形 式

拉丁化和大衆化科學化民族化.....	Boxan (157)
關於文字改革的兩個問題的商榷.....	Boxan (161)
再談漸變突變和民族形式的問題.....	Boxan (164)
新文字與民族形式.....	周有光 (168)

科 學 文 字

把科學方塊化呢？還是把文字拉丁化？.....	張鳴鏞 (172)
科學文字問題.....	張鳴鏞 (176)

關於“科學應該用什麼文字寫”……………	N. Xs. (180)
---------------------	----------------

方 案 研 究

北方話方案的比較研究……………	周有光 (183)
北方話發音標準的商榷……………	宇文長工 (200)

【重要言論・消息】

吳玉章先生談統一語與方言問題……………	(204)
杜伯洛維娜論中國語言文字問題……………	(204)
文字改革意見兩則(郭沫若、錢俊瑞先生的意見)……………	(205)
苗文的拉丁化運動……………	(206)
在全國新聞工作會議上首長們提到關於語文改革的一些話……………	(207)
蘇聯真理報結束關於語言學的討論……………	(209)
東歐兄弟關心我們的文字改革……………	(210)
蘇聯朋友關心中國文字改革……………	(211)
關於掃除文盲開展工農教育問題的解答……………	(213)
斯大林論語言學問題……………	(215)
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協會召開第一屆年會……………	(215)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舉行“斯大林論語言學問題與中國語言研究的聯繫”座談會……………	(218)

【參考文件】

解放一年來全國新文字運動的大概情況……………	倪海曙 (219)
浙江大學新語文研究會第二次總結報告……………	Zhamiying (221)
S.W.Y.在廈門……………	Dch (225)
利用“注音漢字”推行工農大眾識字教育的建議 ……………北京師大中國大辭典編纂處	(231)

第一屆全國工農教育會議中的一個重要提案·····	(235)
一年來語言學的普及傾向·····	羅常培 (236)
十四個月來的上海新文字運動和上海新文字 工作者協會·····	倪海曙 (239)
王二莊農民識字情況調查·····	鄭林曦 (244)

【附錄】

一九四〇——一九四二年陝甘寧邊區新文字運動 大事記·····	鄭拓彬 (253)
一九五〇年中國語文問題紀要·····	杜子勁 (260)

論 文

中國語言學的新方向

羅 常 培

在新民主主義的文教政策下來重估一切學科的價值，標準尺度就是看他們是否合乎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三個原則。自從去年春天以來，我對於自己曾經努力過二十多年的中國語言學就時常追尋它是否合乎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一般要求。這個問題一直不斷地在我的腦子裡縈繞着。照我所考慮的，“共同語言是民族底一個特徵”，中國語言學既然拿中華民族的古今語言作研究對象，它當然不會違反民族的原則。再說，假如咱們承認中國過去有科學的話，那麼，清代學者關於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比起十七、十八世紀的印歐語言學來實在沒有愧色。近三十年來，一班從事語言工作的人們接受了科學的語言學方法，用來調查研究中國固有的方言和一些同源異派的少數民族語言，他們的收穫已經比清代學者又邁進了一步。徐特立先生說：“過去中國的地質研究所和生物研究所，所調查採集的東西都是中國所固有的。因此它的瞭解特別深刻，特別有成績，爲歐美學者所不及。這是值得頌揚的。”（新建設一卷八期頁10）我深以徐老的話爲然。但是在近三十年來的中國學術史上，能够應用西洋的科學方法來

調查研究中華民族固有的材料的，除了地質學和生物學以外，還有語言學可以跟他們鼎峙。至於所謂大衆化，不僅是量的擴大，內容和形式也必須適合大衆的要求和接受的程度。以前關於語言學的研究很少能照顧這一點的；清代的語言文字固然成了經學的附庸；近年來關於語言、音韻、文字的研究也不過成了少數關在象牙塔裡的人們的玩藝兒。不過，大衆化和庸俗化不同，咱們要提倡語言學大衆化，還得貫徹徐老所說的：“大衆化的特點是：去空、去雜、和去孤”。（同上，頁11）

經過一年間的思惟，再加上最近的啓發，我對於中國語言學提出了以下的三個新觀點：

第一、我們得承認語言是社會組織的產物，是跟着社會發展的進程而演變的，所以應該看做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例如，英語 fee 字的歷史反映着畜牧社會把牲口當做財產；北美阿他巴斯干族現在用做“火柴”的詞本義是“火鑽”，這足以考見他們有過“鑽燧取火”的生活；滇邊高黎貢山的傈人把結婚叫做“買女人”，儘管現在的社會風俗已經變遷，終究掩飾不了買賣婚姻的遺跡。說文裡從貝的字都和錢幣有關係，足徵在“秦廢貝行錢”以前，曾經有過“貨貝而寶龜”的貨幣制度。由此可見，一時代的客觀社會生活，決定了那時代的語言內容；也可以說，語言的內容在在足以反映出某一時代社會生活的各面影。社會的現象，由經濟生活到全部社會意識，都沉澱在語言裡面。所以語義發展史實在跟社會生活演變史分不開。

第二、語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面聯繫的。任何社會現象都不能和別的現象絕緣，而獨立存在或發展。各現象間必得彼此關聯，交互影響，才能朝着一定的途徑向前推進。語言既然是社會組織的產物，當然也不能超越這個規律。所以語言學的研究萬不能抱殘守缺地局限在語言本身資料以內，必須要擴大研究範

國，讓語言現象跟其他社會現象和意識聯繫起來，才能格外發揮語言的功能，闡揚語言學的原理。我最近出版了“語言與文化”一本小書（北京大學大眾科學叢書文學院第一種，北大出版部發行）內容包括六項：（一）“從語詞的語源和演變看過去文化的遺跡”（二）“從造詞心理看民族文化程度”（三）“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四）“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踪跡”（五）“從姓氏和別號看民族的來源和宗教信仰”（六）“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它所根據的材料不單不限於傳統的文言，而且不限於大漢族主義的“國語”。所舉的例子儘量想賅括古今中外的各方面，尤其側重國內少數民族和國外文化比較落後的民族的口語。從語言和某一民族或某些民族間的聯繫，往往叫咱們對於較早的人口分佈和遷徙得到有價值的啓示；並且從語言所反映出來的文化因素顯然對於文化本身的透視有很大的幫助。其中討論借字一章材料比較多，篇幅也比較長。從公元第一世紀到二十世紀，漢語和其他語言間的彼此關聯，交互影響，在這一章裡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要想做進一步的研究，還得擴大漢語借詞和貸詞的探索，並且按年代排比起來，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推尋他們跟各方面文化的聯繫。這種研究是跟中西交通史分不開的。在其他各章裡咱們也找出了語言學跟地理學、姓氏學、人類學都有實質的密切關係。咱們如果能夠應用語言和各方面的聯繫去研究歷史或社會現象，在分析具體事物的條件、時間和地點的時候，更可以增加一些把握。

第三、語言的材料可以幫助考訂文化因素的年代。語言，像文化一樣，是由不同年代的各種因素組合成的。其中有些因素可以追溯到荒渺難稽的遠古，另外一些因素不過是由昨天的發展或需要才產生的。假如咱們現在能夠把文化變遷和語言變遷的關係

安排好了，咱們對於文化因素的相對年代就可以估量出來。至於所估量的含混或明確，得要按照特別的情況來決定。照這個法子，語言爲解明文化的次第，可以供給咱們一種“累積的基層”；它對於文化歷史的關係，粗略地說，就像地質學對於古生物學似的。從漢語裡的借字來看，像“師比”、“師子”、“璧流離”、“葡萄”、“苜蓿”之類，反映着漢代或漢以前的文化交流；但是“沒藥”“胡盧巴”之類却直到第十世紀、第十一世紀才見於中國的記載：這一類的文化層次是很顯然的（關於這些例子的詳細解說，參看“語言與文化”第四章）。同在一種語言裡，像西藏語的借字“滑石”和“玉石”，前一個“石”字有k尾，後一個沒有；“缺子”和“鴨子”，“缺”字有p尾，“鴨”字沒有：這也很清楚地表現他們從漢語借入藏語的年代前後不同。語言文字在社會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列昂節夫也曾經說過：“我們關於原始社會的知識之寶貴材料是語言；有許多文字是由遠古傳來的。”不過咱們得要注意，語言的變遷比文化的變遷慢得多；文字的變遷比語言更慢。有些文化因素早已變了，可是它的蛻形却仍舊在語言文字裡保存着。咱們考訂文化年代的時候，不單要把他們的層次順序分別清楚，還得認識語言文字的年代一般地要比文化的年代晚一點兒。我在“語言與文化”的第二章裡曾經引用了一些說文裡的例字去推究社會形態，這些文字雖然都是漢代才結集起來的，可是他們並不都是漢代造的，所代表的意識也不全是漢代的社會形態。咱們固然不能因爲說文裡有“斬”字，就斷定這種慘刑在漢代還普遍流行；同時也不能根據甲骨文裡的“臣”“奚”等字就斷定奴隸社會到殷代才開始。應用語言文字來考證歷史，最要緊的還得聯繫當時社會的其他情況。例如，照董作賓的意見：殷代的禮制有新舊兩派，舊派篤守成規，以武丁爲代表；新派提倡革新，以祖甲爲代表。就貞卜制度來說，“卜行

止，記每日王所經過的行程，只見於新派；而卜告、卜禱、卜旬、卜求年、受年、卜月日食、卜夢、生育、疾病、有子、死亡、求雨、求啓各事，則只見於舊派，新派是很少見的。……這都可以看出他們兩派對人事和自然界的現象，觀念並不相同。反之，因為舊派卜貞事項的繁夥給我們留下更多的史實。因為武丁、文武丁好卜王后的生育、王子的疾病等等，使我們多知道些他們婦子之名。可是我們即使知道了武丁是多婦多子的，却不能說這是武丁一人如此，或者說到了他才實行多妻制。這很明白的，新派不見得不是同樣的多婦多子，只不過是‘不占而已矣’。知道了兩派卜事的不同，對於舊派的卜事，我們就應認為這是殷代的一般現象，偶然遺留下來了，並不是一時一王的特殊現象。”這種觀點是用語言文字考證歷史的人們所應該掌握的。

如果能够建立這個觀點，那麼，中國語言學不單是民族的，而且不拘守着狹隘的民族主義；不單是科學的，而且逐漸跟馬列主義的科學聯繫。它所根據的是和理論結合的客觀事實，當然不會“空”；語義演變順着一定的規律發展，具有科學原則和活的生命，也不至於“雜”；語詞內容處處受社會環境和經濟生活的影響，隨時隨地都跟文化的各方面發生有機的聯繫，更不能說到“孤”；從這上面出發的語言學研究才可以稱得起大衆化，而不至流於庸俗化。爲給從事語言工作的人們指點一些明確的方向，我願意再提出以下的四項建議：

第一、爲記錄全國各地方言和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語言，咱們首先得製定一套拼音文字。自從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以後，我們已經收到幾百種新文字方案了。一時的風尚，大有一九一三讀音統一會開會時“個個想做倉頡，人人自算佉盧”的趨勢。我個人覺得，不管哪種方案，祇要經得起人民大衆考驗，能够達到解除文盲的目標的，就算是頂好的。就已往推行的成績，形式的

簡易和學術上的聯繫，我是贊成“方案國際化”的。有人假借民族化的招牌，要把“新”文字變成已經死亡的西夏文或安南的字喃一類的東西，那簡直是違背發展的規律。至於現在試行的拉丁化新文字應否補訂，倒得看國內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實際音韻系統來決定。就北方話的拉丁化方案來說，首先應該考慮的是應否標註聲調的問題；其次就是它所用的符號跟其他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音位”有沒有衝突的問題。我個人意見頗傾向於勞乃宣簡字全譜以多包少的原則，而符號參用拉丁字母和國際音標的集合體，聲調的標註也不該避免。推行時應按照當地的實際語音需要，抽出一部分來學習，不必普遍記憶本地方言用不着的音標，爲解除文盲起見，從勞動大眾着想，也應仿照蘇聯的辦法先從不同的方言或族語入手。列寧對於民族主張爲了聯合而分開，斯大林更推廣到語言一方面。北方話代表廣大的方言區在它所屬的區域內，當然拿它作推行的根據；但是爲了解除和北方話懸殊的文盲，還是先從他的本地方言着手比較容易得多。關於這一層，在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的方案研究委員會裡還要從長討論，這裡只是我個人一點不成熟的意見。

第二、對於語義的研究，咱們不應該再墨守傳統的訓詁學方法：應該知道詞義不能離開上下文而孤立的，詞書和字典裡的解釋是不可靠的；應該用古生物學的方法分析各時代詞義演變的“累積的基層”；應該用歷史唯物論的方法推究詞義死亡、轉變、新生的社會背景和經濟條件。取材的範圍不可再存“雅”“俗”的偏見，自經籍子史、詞書、專集、語錄、筆記、小說、戲曲、傳奇，以至於民間諺語、大眾文藝都應該廣泛地搜集。研究的方法一方面要由上而下地從經籍遞推到大眾口語，另一方面還得根據大眾的詞彙逆溯到他們最初的來源：照這樣，就可以把“古今雅俗”的材料一切都聯繫起來了。這種工作一個人做固然非常繁重，

要是計劃、有步驟地集體進行，我敢保證它可以勝利完成的。

第三、對於現代方言的研究，已往二十多年來太偏重語音一方面了。現在要想製定拼音文字的新方案，固然還得先把各地方音系統弄清楚，可是咱們要想和第二個建議配合，特別得着重詞彙的蒐集和研究。這種工作的進行，首先要注意每個常用詞彙在各地人民嘴裡的活方言有什麼異同。比方說，“飲”“食”兩個詞彙在北京話裡已經死亡了，可是在廣東話裡還活着；古漢語“尋”、“怎”、“甚”、“恁”的m尾和“眨”的p尾，現代說北京話的人沒有承認他們存在的，可是口語裡的“丁口什麼”、“怎麼”、“甚麼”（什麼）、“那麼”和“眨巴”還照樣流行着；關於“房”和“屋”的大小，為什麼南方和北方不同？關於嗅覺的語詞為什麼有的地方叫“聽”，有的地方叫“聞”？同是一種黑顏色，在各地方言裡却有“黑”、“烏”、“玄”的叫法；同是一個“青”字，在各地方言裡却有的代表藍色，有的代表黑色。諸如此類，不勝逐一列舉。咱們要想中國語言的統一，必須先從分析這些矛盾開始。其次，咱們得深入各行業各階層的裡面分頭調查他們的慣用語，並編成分類詞彙。凡是曾經學過外國語文的人們大概總該知道他們各行業和各階層間都各自有一套豐富的詞彙。比方說，農民有農民的慣用語，工人有工人的慣用語；打獵的有打獵的詞頭兒，開鑛的有開鑛的術語；汽車司機的行話和海上水手的不同；青年學生間打諢竟使一班老頭子瞠目。可是這些全是活鮮鮮的詞彙，並不是備而不用死的語。中國的各行業和各階層裡何嘗沒有這一類的詞彙呢？只是任他們自生自滅，語言學家不加搜集，文學家不能應用；一方面委棄寶藏，一方面感覺貧乏，這够多麼不經濟？毛澤東主席說，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以前對於自己所描寫的對象，“言語不懂。你們是知識分子的言語，他們是人民大眾的言語。我曾經說過，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